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

郭彦森 王旭阳

摘要:“第二个结合”不是两种思想文化时空相遇后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回答时代课题、探索中国式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规律,是“为什么要结合”的根本原因和“第二个结合”的生成逻辑。“哪些方面的内容可以结合”,不应陷入抽象思辨,而应通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特点进行文本分析和观点考据,从而作出准确判断。至于“结合的成果是什么”,从表面上看,“第二个结合”是两种思想文化的关系,而实际上是以结合的方式回答中国实际问题。因此,目前虽然把“第二个结合”从原来的“一个结合”中独立出来,但其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大范畴,其最终理论成果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来,这是成果呈现的必然逻辑。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7-0023-0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以后,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研究不断升温,产生一些积极成果。然而,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偏颇之处:一是脱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基础,撇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大前提,孤立地从两种思想文化,特别是仅仅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第二个结合”,这根本不能说明两者“为什么要结合”。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上可以实现全面结合、完全结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客观事实。三是认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成果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严重低估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因此,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第二个结合”,需要把“第二个结合”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遵循从“提出结合任务”到“实现两个结合”最后到“形成结合成果”的演进逻辑,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内在机理。

一、“提出结合任务”的内在逻辑

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此,学术界有一种典型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古代中国,其影响力主要在亚洲特别是东亚,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近代欧洲,并首先在欧美国家产生影响,两者的思想内容和各自的存在时空本来并无交集,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演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存于现代中国的社会时空中并必然发生了实际上的联系,从而向全世界的学者提出了二者的关系问题”^[1]。这种观点主要从本土与外来两种思想文化的时空相遇来解释“第二个结合”。显然,这种解释对问题的认识流于表面,不能全面深入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要结合”的问题。

1. 从两种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看

仅就两种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从不同角

收稿日期:2022-12-20

作者简介:郭彦森,男,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南郑州 450001)。王旭阳,男,香港都会大学硕士生。

度认识就会有不同的关系特性,如内容上的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先进与落后,时间上的传统与现代,空间上的本土与外来,主体上的大众与精英、民族与世界,地位上的主流与非主流等。众多关系中,内容上是否文明、先进、科学,是两种思想文化之间的本质关系,其他关系都属于非本质关系,相对于内容而言只具有形式意义。这意味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由内容决定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空相遇问题。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佛教、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这三者与中国文化都属于外来与本土的关系,但三者的结合方式、融合程度、前途命运却各不相同。

2.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并不是随之就产生了“第二个结合”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理论品质,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便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1921—1927年间,当时党并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迫使党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但当时的党中央也没有马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党内存在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2]956}。他们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立场,错误地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二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先后经历三次“左”倾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坚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左”倾冒险主义。三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三条路线中“左”和右的错误路线都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其现实逻辑是大革命和秋收起义失败证明放弃斗争的右倾路线和急躁冒进的“左”倾路线都走不通,因此中国共产党客观上提出了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时代课题。生死存亡的残酷现实迫使毛泽东选择到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这条新路,并在新的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和积累斗争经验,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创了革命斗争新局面,奠定

了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实践基础。其理论逻辑是革命失败后既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也没有坚持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是科学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做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然后,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2]988}。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等理论。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付出沉重代价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最终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和认同。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3]2}。也就是在不断总结和积累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过程中实现了“两个结合”。单就“第二个结合”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式革命道路新的实践探索是“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前提。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又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更加清楚地表明“第二个结合”不是简单的两种思想文化的时空相遇问题,而是具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惊人相似的内在逻辑。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左”倾路线不断强化,最终走向极端“左”倾主义,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或个别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以及照搬照抄别国模式都不可能成功。这客观上使得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16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时代课题。面对这一新的时代课题,当时党内实际上也存在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是当时担任党中央领导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5]123};二是“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4]166};三是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三条路线中“左”倾路线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资

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两者都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任务。只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作出重大决策,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同时又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正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与此同时,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决不是两种思想文化时空相遇就会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遭遇失败或重大挫折证明了原来的路走不通,提出了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的时代课题,这是“两个结合”也是“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基础。新的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过的全新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逐步掌握规律。“第二个结合”就发生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过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回答时代课题,探索中国式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规律,是“提出结合任务”的内在逻辑,也是“为什么要结合”的根本原因。

二、“实现两个结合”的内容特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结合,即哪些方面的内容可以结合、具体的结合方式是什么等,是深刻认识“第二个结合”需要弄清的重要问题。然而,目前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却是笼统的、抽象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结合。甚至有学者认为,两者可以完全结合、全面结合,亦有学者详细列举了9个方面的内容^①。如何评价这种观点,如何认识这一问题,不应陷入抽象思辨,而

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特点进行文本分析和观点考据,从而作出准确判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时代课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各不相同,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结合的内容和结合方式也各有特点。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结合”的内容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中国式革命道路、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党的建设等。这些内容不能笼统地认为都是“两个结合”的产物,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两个结合”,从而准确把握“第二个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肯定了当时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动力、性质和前途等,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2]953}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其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只是“第一个结合”,没有“第二个结合”。

中国式革命道路理论主要包括武装夺取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两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思想。斯大林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之一,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既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是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总结。因此,这一理论部分内容是“第一个结合”的产物,部分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性经验,也不存在“第二个结合”的问题。

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光辉的篇章。这一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是“自己流血的经验”^{[6]172},或者说是中国革命战争血战史的经验^{[6]192}。毛泽东回忆道:“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6]204}二是深受中国古代兵法智慧的启迪。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反复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并明确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2]490}他在阐述为什么要坚持游击战时,理论原则引用的是孙子所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具体战例举的是齐鲁长勺之战和《水浒传》中林冲大战洪教头。在阐述如何以弱胜强时指出:“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6]204}在阐述如何造成敌人错觉,从而出其不意战而胜之时指出,错觉就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方法就是“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之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6]209}。此外,还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歼灭战原则,战略上“以一当十”和战术上“以十当一”的集中优势兵力原则,要防止“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等思想。那么,“自己流血的经验”同中国古代兵法是如何结合的呢?就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他强调指出,这件事非常重要,“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6]181}。从“两个结合”的角度看,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既不是“第一个结合”,也不是“第二个结合”,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是中国古代兵法的灵活运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思想建设方面强调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加强党性修养。组织建设方面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作风建设方面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等。这些方面的思想总体上都属于“两个结合”的产物。其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强调思想改造,德才兼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也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只是“第

一个结合”,没有“第二个结合”;农村包围城市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没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性经验,因此也不存在“第二个结合”问题;军事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没有,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丰富,因此也不存在“第二个结合”问题,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或创新性发展;只有党的建设思想属于“两个结合”,但其中有些内容(如实事求是)也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上情况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中属于“第二个结合”的内容并不多,也就谈不上完全结合、全面结合。

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个结合”的内容特点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从“两个结合”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总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设想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或者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也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更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3}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二,绝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性经验。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7]258-259}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独创性经验的总

结。例如,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破除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设立经济特区、实行“一国两制”、提出“三步走”战略,都是原创性构想;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作出全新判断;等等。

第三,较少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以邓小平理论为例,通读《邓小平文选》中1977年至1992年间邓小平的所有讲话,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只有两处:一是关于小康社会的论述。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237}二是在回答香港政策会不会变时讲道:“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原则。”^{[7]72-73}此外,再无其他有关论述。在比较的意义上,邓小平强调要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方面的论述比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要多得多。邓小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7]382}“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7]101}由此可见,说邓小平理论也实现了“第二个结合”,没有文本依据。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结合”的内容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就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其显著特征是“两个结合”。

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我国继续发展有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

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也使得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8]5}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着眼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理念、发展格局、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等,善于运用中国古代典籍、经典名句、格言警句等表达观点、阐明立场、抒发情怀,并且旁征博引、博古通今、贯通中西、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其涉及的人物,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涉及的典籍,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涉及的内容,丰富多样,可归纳为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第一,哲学观点。习近平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讲话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民以食为天”;荀子、刘向、陆游、王夫之等人的知行观,如“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知行相资以为用”等;并批判了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等形而上学错误行为。

第二,道德修养。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等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理念,指出其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9]56}，“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

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10]¹⁷¹。他从私德、公德、大德三个层面明确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需要传承和弘扬的内容,例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言必信,行必果”“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利济苍生”“兼善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止于至善”^[10]¹⁷⁰。

第三,家教家风。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理、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优秀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11]³⁵³他引用古人所说“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强调要注重家教。他引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古训,说明家风的重要性,并特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也”。

第四,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中国古代经典最多,内容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一是治乱兴衰经验。如,“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帮之兴,由得人也;帮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也”;“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国虽大,好战必亡”。二是治国理政智慧。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之大,黎元为先”;“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为国不可以生事,也不可以畏事”。三是为官做事之道。如,“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德莫高于爱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政

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为官避事平生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公生明,廉生威”;“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禁微则易,救末者难”。四是法治与创新。如,“法者,治之端也”;“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外,还有信念、仁贤、劝学、笃行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天下大势。即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下观。如,“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计利当计天下利”;“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礼之用,和为贵”;“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在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中,习近平总书记最善于用典,常常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画龙点睛,不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其鲜活的时代价值,实现了“第二个结合”;同时,也展现了他高超的思想能力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向全世界发出了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声音”,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传承者、弘扬者。

三、“形成结合成果”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什么,即结合成什么,多数学者认为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观点,总体而言不能说错,但是,由于对结合成果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缺乏具体分析和详细说明,因此有些地方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一是容易让人误认为结合以后存在并列的两种思想文化体系,即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容易被误解为结合的成果是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板块组合、拼图或嫁接。试析如下。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什么”,需要对理论成果形式进行详细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际这三者

的相互关系中,有四种形式的理论成果:一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得出的原创性认识和独创性经验。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老祖先没有说过,其他国家也没有干过,是我们自己的创造。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个结合”)的产物。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相关思想资源。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而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产物。即面对中国某一实际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可以提供理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相应的思想资源,因此是以两者结合的方式回答中国实际问题。这四种理论成果中,原创性认识和独创性经验、“第一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三种形式的理论成果比较容易理解,它们都是以中国具体实际为认识对象,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活动为基础,以把握实践活动规律为目的,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不能相互替代,但又相互联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指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或同一部分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四种形式的理论成果中“第二个结合”稍微复杂一点,它表面上看是两种思想文化的关系,而实际上是以结合的方式联系中国具体实际,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回答中国实际问题。

“两个结合”都是为了回答中国实际问题,就需要厘清“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来认识。从历史的维度看,在还没有提出“第二个结合”以前,原来的“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具有广义性,包括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化多方面的实际情况。此时“第一个结合”内在地包含着“第二个结合”,或者说“第二个结合”从属于“第一个结合”,两者是包含或从属关系。然而,当把“第二个结合”从原来的“第一个结合”中独立出来以后,“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就只有狭义内容,不再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实际情况,此时“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就成了一种并列关系。这种并列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8]17}特别是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2]。

“两个结合”都是为了回答中国实际问题,意味着“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成果不是形成并列的两种思想文化体系,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板块组合或拼接、嫁接,而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两个结合”放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3]9}的主题下讲,并最后落脚到“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3]10}。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讲得更具体:“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8]18}或者说,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8]18}。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第二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和作用表现,要求我们在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时,既要充分认识其重要作用,也不能无限拔高。

仔细分析从原来“一个结合”到现在“两个结合”的发展过程,会深刻体会到我们党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14]37},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解决了“挨打”和“挨

“饿”问题以后,需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一党长期执政容易滋生腐败,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凸显出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这些领域主要涉及道德建设、法治建设、党的建设、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恰好在这些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和独特的中国智慧。从原来“一个结合”到现在“两个结合”的发展,也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变化、内容深化。中国式革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属于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供的思想资源有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表现为“一个结合”。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思想资源的领域相对较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表现为“两个结合”。另外,提出“第二个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对过去我们错误对待传统文化的某种纠正。“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不同看法。五四时期,学术界、思想界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全面批判,其消极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除。即使今天,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仍然存在很大分歧。”^[9]⁵⁵因此,特别需要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9]⁵⁷,因此,目前的重点是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高度。

注释

①高长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四题》,《红旗文稿》2018年第5期,第24—26页。

参考文献

- [1]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6):14-23.
-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9]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2]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uo Yansen Wang Xuyang

Abstract: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s not a problem that naturally arises after the encounter of two ideologies and cultures in time and space. Answering the topic of The Times and exploring the law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why should we combine” and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second combination”. “What aspects of the content can be combined” should not be trapped in abstract speculation, but should make an accurate judgment through the text analysis and viewpoint examination of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arxism. As for “wha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n the surfac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deologies and cultures, but in fact, it is a combination of ways to answer China’s practical problems. Therefore, although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original “one combination” at present, it still belongs to the broad category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its final theoretical results are presented through Marxism in China,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logic of the results.

Key words: the “second combination”; Marxism in China;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责任编辑:思 齐